

以色列的獨立建國——美國的承認*

施正鋒

東華大學民族發展暨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摘要

以色列在 1948 年宣布獨立建國，美國立即加以承認。本文在探討美國為何要承認，特別是杜魯門總統的角色。我們先將簡單敘述以色列是獨立建國的歷史背景；接著，我們會觀察杜魯門的人格特質；再來，我們要檢視兩個可能影響美國承認以色列的外部因素，包括英國的態度、以及蘇聯的威脅；然後，我們會考察兩項具有爭議性的內部因素，包括官僚體系、以及選舉考量。

關鍵詞：以色列、宣布獨立、美國承認、杜魯門

* 發表於台灣國際研究學會主辦「瞭解當代以色列民主政治學術研討會」，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進修推廣學院大樓 2 樓第一會議室，2011/09/17。

Both the Prime Minister and myself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a desire to give the Jews their rightful place in the world; a great nation without a home is not right. My personal hope is that all Jews will make good in Palestine and eventually found a Jewish State.

Arthur James Balfour (Feis, 1969: 13)

壹、前言

以色列是在 1948 年 5 月 14 日宣布獨立建國，在十一分鐘後，立即獲得美國的「事實」(*de facto*) 承認¹。儘管最後還是要靠戰場的勝負決定生存，不過，美國在生死交關適時承認，讓以色列人大為振奮。有關於以色列獨立建國的研究，大致上可以歸納為三大類，包括以色列人復國運動 (Zionism) 的奮鬥²、國際外交承認的運作³、以及與阿拉伯國家對抗的獨立戰爭。本文想要探討的是，究竟美國當時為甚麼會承認以色列，尤其是當時美國總統杜魯門 (Harry S. Truman, 1884-1972) 的角色。

對於這個課題，學術上的成果雖然未必是汗牛充棟，不過，還是已經累積相當豐富的文獻。大體而言，對於杜魯門承認以色列的研究，大致可以分為歷史學者／傳記書寫者、以及政治學者／外交人員兩大類：前者基本上是以杜魯門的信仰、道德、或是信念來著手，採取比較正面肯定的態度；相對地，後者則多以國家利益為出發點，認為杜魯門當時為了國內政治考量，屈服於美國猶太人遊說團體的選票壓力⁴ (Ottolenghi, 2004)。儘管

¹ 以阿戰爭於 1949 年 1 月 7 日停火，美國於 1 月 31 日予以「法理」承認，聯合國安理會接著在 3 月 4 日正式承認。不過，話又說回來，即使沒有美國的承認，以色列也會生存 (Spiegel, 1985: 38)。

² 有關於猶太復國運動者的發展，見 Rubinstein (1984)、以及 Sachar (1979)。

³ 有關於猶太人在國際外交舞台的努力，見 Taylor (1970)、以及 Elath (1976)。

⁴ 也就是「個人動機」與「官僚政治」的不同解釋。Cohen (1982) 分別稱為「白宮派」、以及「國務院派」，也就是理想主義的杜魯門、以及務實、投機的杜魯門之別；Kirkendall (2009: 11) 分別稱為「密蘇里學派」、以及「修正主義派」；Bickerton (1981) 則稱為「敏感度」、以及「專業性」決策的差別；Judis (2008: xxvi) 則區別為理性、以及感性／政治性的決策。Smith (1976) 則將歷史學家對於杜魯門的認識分為「自由主義」、以及「修正主義」的觀點。請參考 Fetter (2008) 對於兩派的比較。

如此，比較令人困惑的是，我們迄今看到的多是各說各話、各執己見，並沒有多少對話⁵。到目前為止，除了傳記、或是回憶錄⁶，相關的文件已經漸次解密⁷，我們因此有必要檢視現有的研究，重新了解到底杜魯門總統當時的政策是如何制定的。

根據比較外交政策的理論⁸，我們可以從三個分析層級（level of analysis）來解釋國家的對外行爲（Waltz, 1979），也就是國際體系、國家／社會的特色⁹、以及決策者的人格特質¹⁰。前者可以算是國外因素，第二項者則屬於國內因素，不過，不管是來自國外、還是源自國內的因素，終究還是必須經過決策者的認知、以及判斷，才有可能影響到外交政策的制定¹¹。我們以開車前往某個目的地來做外交決策的比喻，影響到達目標的因素可以分爲車外（路況、天候）、車況（品牌等級、里程數）、以及駕駛（技術、心情、習慣、經驗）。

由於美國在戰後確立超強的地位，本身就是國際新秩序的擘畫者，不像一般小國，必須屈從於國際結構的框架、或是規範，因此，國內因素相對上看起來就會比國外因素有影響力¹²。此外，當美國總統對於特定政策沒有特別關注時，尤其是在並未明顯涉及國家利益之際，各種國內因素就有機會左右總統的決策。由於中東並非杜魯門的外交政策重點，官僚體系、

⁵ 請參考 Shih 與 Wu (2005)、以及 Lansford (2008) 就理論上合成 (synthesis) 的嘗試。

⁶ 當然，Cohen (1982: 2) 提醒我們要小心回憶錄的使用，畢竟政治人物有自我歷史定位的考量，譬如說，馬歇爾 (Marshall, 1948; Pogue, 1987) 與杜魯門 (Truman, 1956) 的紀錄就有差距，更不用說護主心切的幕僚 (Clifford, 1977, 1991)。

⁷ 譬如說，國務院有關 1948 年的外交檔案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8*) 在 1976 年公佈，目前全文可以在網站查閱 (見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⁸ 見 Hermann 與 Peacock (1987)、Kaarbo 等人 (2002)。

⁹ 譬如國家的強弱、憲政體制 (總統與國會的關係)、政黨體系、官僚體系、民主化程度、經濟發展階段、族群結構等。

¹⁰ 包括理念、個性、風格、動機、興趣、經驗、以及訓練等。

¹¹ 也就是「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 的途徑，見 Shih 與 Wu (2005)、以及 Maszka (2008)。

¹² 就本體論而言，如果以結構性 (structure) 的觀點來看，國家的行爲勢必要受到外部的結構所制約；假若以個體 (agent) 的立場來看，國家行爲者不僅可以選擇抗拒外來的結構性限制，甚至於可以建構有利於自身的結構；當然，根據較新的看法，個體與結構是可以相互建構。

或是利益團體的影響力就比較有機會發揮出來（Ottolenghi, 2004: 968; Spiegel, 1985: 10-11; Bain, 1979: 86）。

我們的觀點近似於 Evensen（1992），也就是在關心冷戰的大戰略下，杜魯門對於蘇聯的擴張已經心有定見，覺悟美國必須挺身而出、取代英國，只不過，他未必像國務院的下屬一樣杯弓蛇影，把以色列視為對方潛在的馬前卒。相對地，民主國家的政治領導者必須回應選民的看法，尤其是老百姓對於猶太人浩劫（Holocaust）的同情¹³，因此，面對國會選舉、以及總統大選，杜魯門不能沒有國內政治的考量，尤其是思考如何透過選票來建立自己的正當性，因而有時會看來左右搖擺；至於國務院的掣肘，如果可能破壞大局，總統當然要想辦法加以馴服立威，卻又不能讓國務卿感到太尷尬。換句話說，杜魯門應該是典型的務實主義者，至於美譽為人道主義者、或是貶抑為機會主義者，都未必公允。

在這篇論文裡，我們先將簡單敘述以色列是獨立建國的歷史背景；接著，我們會觀察杜魯門的人格特質；再來，我們要檢視兩個可能影響美國承認以色列的外部因素，包括英國的態度、以及蘇聯的威脅；然後，我們會考察兩項具有爭議性的內部因素，包括官僚體系、以及選舉考量。

貳、歷史背景

以色列人（Israelites）／猶太人（Jews）／希伯來人¹⁴（Hebrews）的歷史，大致上可以由舊約聖經獲得了解，特別是前面的「梅瑟五書」。他們的祖先 Hapiru（或是 Habiru¹⁵）起源於人口擁擠的美索不達米亞肥沃月灣平原，是一個介於定居、以及游牧之間的民族，而 Abraham 是其中一支的領袖（Johnson, 1987: 13-14）。在往西遷往 Canaan 的過程，他們由家族逐漸

¹³ 希特勒總共屠殺了六百萬猶太人，見施正鋒（1998）、以及 Gilbert（1985）。

¹⁴ 有關於這三個名詞的差別，見 Johnson（1987: 20）的討論。

¹⁵ Roth（1970: 3）稱之為 Ibrim，意思是來自 Eber 的人；後者的意思是「大河那邊」也就是幼發拉底河（Euphrates）。在語言學上，他們屬於閃族（Semitic）的西部分支，Johnson（1987: 13）則稱為 Arameans。

擴充，凝聚記憶、以及傳統，特別是透過一神教的信仰，將諸多相互征戰的部落初步整合為民族的雛型；到了西元前十二世紀，巴勒斯坦的以色列民族已經相當均一，也就是外來的 Arameans 游牧民族終究結合定居當地的 Canaanites (Roth, 1870: 4-11)。

與其他所謂的「墾殖社會」(settlers' society) 相仿，以色列的發展是由外族入侵、通婚、到同化而成的；面對外來的侵略，特別是佔據肥沃海岸平原的 Philistines，以色列人同仇敵愾之情油然而生，配合共同的血緣、語言、以及宗教，民族的塑造日臻成熟，並建立王朝 (Roth, 1970: 15-18)。不過，在大衛王過世後，因為內爭而力量削弱，而南部的 Judah 更是割席而去。從此，以色列人必須周旋於來自西部的愛琴海（希臘、羅馬）、東部的兩河流域（亞敘利亞、巴比倫、波斯）、以及南部的埃及等三股力量 (Roth, 1970)。

在西元前 750 年，亞敘利亞入侵北邊的以色列王國、擄走以色列人；巴比倫又在西元前 588 年打敗南邊的 Judah 王國，再度擄走以色列人；直到波斯在西元前 538 年征服巴比倫，國王 Cyrus 才同意猶太人回鄉；然而，馬其頓（希臘）在西元前 323 年擊潰波斯，進而取得以色列；接著，羅馬則又在西元前 63 年君臨，乾脆放逐以色列人；此後，阿拉伯人（638 年前）、十字軍（1099 年）、Mamluk 蘇丹（1291 年）、鄂圖曼土耳其（1517 年）相繼統治巴勒斯坦 (Roth, 1970; Mulhall, 1995)。在夾縫生存的以色列人，有時以朝貢王國的地位來維持形式上的獨立、或是自治，再不就是淪為異族鐵蹄的殖民地，而最壞的情況則是被強迫集體離開故土、流亡異鄉。

在十八世紀末，開始有少數猶太人回到巴勒斯坦，到了十九世紀中葉，人數已達一萬三左右；在 1882-1903 期間，俄羅斯的猶太人遭受迫害 (pogrom)，有些人移民西歐、或是美國，也有兩萬五千人選擇前往巴勒斯坦；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在 1904 年爆發之前，由於反猶迫害事件再起，又有四萬多猶太人移回巴勒斯坦，此時，在巴勒斯坦的猶太人總數已經達到約有六萬人，而阿拉伯人則有近七十萬人 (Mulhall, 1995: 45、53、55)。

以色列人復國運動在十九世紀開始出現，特別是 Theodor Herzl (1860-1904) 在 1896 年出版有名的《猶太國》(The Jewish State)，主張猶

太人不只是要遷離充滿敵意的俄羅斯，還必須有自己的國家（Herzl, 1988）；次年，猶太人在瑞士巴塞爾（Basel）首度召開復國大會（First Zionist Congress），通過 *Basel Program*，倡議在巴勒斯坦建國¹⁶，展開長達半世紀的復國運動。對於復國運動者來說，有了自己的國家，就可以保有自己的宗教、語言、以及文化，不用再看別人的臉色、或是努力去接受同化，同時，也可以選擇正常的農場、或是工廠的工作，不用被侷限於做小生意、或是開銀樓（Bethell, 1979: 15）。以色列未來的總統 Chaim Weizmann（1874-1952）在接受英美調查團（Anglo-American Committee of Inquiry）訪問時振振有辭地說，阿拉伯人在中東已經有好幾個國家，而猶太人連半個也沒有，自然比較上更有建國的權利¹⁷（Mulhall, 1995: 122）。

David Lloyd George（1863-1945）在 1916 年底接任英國首相，認為若要保護英國在蘇伊士運河的利益，勢必不能放棄巴勒斯坦。在 1917 年，為了號召猶太人¹⁸ 支持協約國（Allies）對抗同盟國¹⁹（Central Powers），英國在進攻巴勒斯坦前夕公佈『巴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允諾猶太民族（Jewish people）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園」（national home），也就是「保護國」的安排（Mulhall, 1995: 62-63; Radosh & Radosh, 2009: 3）。二次大戰後，英國決定維持在中東的基地、以及影響力，由於阿拉伯人口居絕對多數，當然要安撫阿拉伯人²⁰。英國在 1939 年公佈『白皮書』（*White Paper*），表面上只是限制猶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實質上卻是葬送他們建國

¹⁶ 對於阿拉伯人而言，這不啻池魚之災（Bain, 1979: 10）。在這時期，阿拉伯人佔了巴勒斯坦人口的 95%、擁有 99% 的土地；美國駐耶路撒冷領事 Selah Merrill 在 1891 年巡視猶太人的屯墾區後表示：「巴勒斯坦還不適合猶太人，而猶太人也還不适合巴勒斯坦」（Neff, 1995: 7, 9）。事實上，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 1836-1914）曾經建議肯亞的高地給 Herzl，被婉拒（Sacher, 1952: 2-3）。

¹⁷ 對於同情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看法，見 Flapan（1987）、以及 Khouri（1976）。

¹⁸ 當時，蘇聯的猶太人視德國為解放者。

¹⁹ 協約國包含法國、俄國、英國、義大利、以及美國，而同盟國包括德國、奧匈帝國、保加利亞、以及土耳其。

²⁰ Sachar（1972: 506-507）認為英國之所以冥頑不靈，是因為猶太人的游擊戰給他們帶來嚴重的傷亡。不過，這應該事先有雞後有蛋、還是先有蛋後有雞的問題。荒繆的是，這些顛覆的手段的訓練、以及武器的提供，是英國人在戰爭期間未了對抗德國人的入侵所為（Crossman, 1947: 170）。

的梦想，讓他們注定只能當一個阿拉伯國家內部的少數族群²¹。

至於美國，第二任總統亞當斯（John Adams, 1735-1826）在年邁之際（1818），曾經寫了一封感性的信給美國猶太人領袖 Mordecai Noah（1785-1851）：「我真希望猶太人再度在 Judea²² 有自己的獨立國家」；然而，後面有一段往往被忽略掉了：「一旦他們恢復自己的獨立政府、不再被迫害，一些與眾不同的特色將會很快消逝，就有可能及時變成基督徒²³」（Grose, 1983: 6）。

儘管以色列人復國運動符合威爾森總統（Woodrow Wilson, 1856-1924）所倡議的民族自決理念，而國會參眾兩院甚至於在 1922 年通過 *Lodge-Fish Resolution*，公開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國，不過，由於美國在中東並沒有淵源²⁴，歷來的美國總統多半不願意捲入盟邦的家務事。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 1882-1945）雖然對內為了猶太選票，在言語上必須有所承諾，讓他們相信美國的支持，不過，對外為了安撫阿拉伯國家，實際上還是虛應故事²⁵（Cohen, 1990: 48-49; Schultzing, 1994: 215; Judis, 2008: xxi）。真正付諸行動的美國總統，只有杜魯門；多年後，他自己對於羅斯福的評語是：原來那麼多漂亮的承諾，都是花言巧語（Radosh & Radosh, 2009: 30）。

²¹ 英國的解釋是，雖然猶太人有權回到巴勒斯坦的家園，並不意味著他們在該地的人口一定要過半、也不表示他們必須要建立一個猶太國（Radosh & Radosh, 2009: 5）。

²² 這是指巴勒斯坦原文的南半部。

²³ 對於美國的基督徒而言，猶太人就是因為當初不相信基督為救世主（Messiah）而被放逐（Mead, 2008）。然而，對於早期的猶太人來說，基督信仰只不過是猶太教的一個分支（sect）而已、甚至於是一種異端。

²⁴ 國務院在 1909 年才設立「近東處」（Near East Division），目前稱為「近東局」（Bureau of Near East Affairs）。

²⁵ 一般而言，羅斯福希望殖民地能經過聯合國的託管而獨立，也就是大英帝國的去殖民化（Louis, 1978）。不過，他對於猶太人復國，一向採取含糊其辭的伎倆，一方面公開向猶太人作保證，譬如授權美國猶太人領袖發表支持建國的聲明，另一方面則私下則向阿拉伯人交心，當眾議院未能通過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國的決議，羅斯福還向議長 Sam Rayburn（1882-1961）表示謝意；基本上，前者是國內選票的壓力，後者則是考慮到是否有可能與阿拉伯國家結盟（Grose, 1983: 146; Neff, 1995: 25; Schechtman, 1966: 27; Spiegel, 1985: 12-14）。難怪經歷兩朝的 Clark Clifford（1906-98）會懷疑，如果羅斯福多活幾年，以色列這個國家是否還有可能出現！（Grose, 1983: 156）。

杜魯門對於猶太人的關注，始於參議員任內的選區服務，是幫助歐洲的猶太難民（displaced person）取得移民簽證，基本上屬於還人情性質（Cohen, 1990: 29-34）。英國在1939年公佈『白皮書』反對分治，杜魯門要求將一篇批評的報紙文章列為國會記錄²⁶，認為這又是姑息主義的作祟（Cohen, 1990: 44-45）。連任參議員後，他也跟著大部分政治人物加入聲勢浩大的猶太人巴勒斯坦復國的遊說團體 American Palestine Committee²⁷。

對於杜魯門來說，雖然巴勒斯坦不是很重要的問題，然而，儘管不想碰、卻又不得不做決策，因此也夠令他心煩的了²⁸（Spiegel, 1985: 16, 21; Radosh & Radosh, 2009: 260）。在波茨坦會議（Potsdam Conference, 1945.7.16-8.2）上，他先是要求託管巴勒斯坦的英國開大門給猶太人移民（1945），回國後，接著又跳過國務院，親自寫了一封信給剛上台的英國首相 Clement Attlee（1883-67），開口要增加十萬巴勒斯坦猶太移民簽證的配額（1945.8.31），給英國造成很大的壓力。

面對1946年的國會期中選舉，杜魯門先是表示將要求國會開放猶太難民配額，接著又發表著名的 *Yom Kippur Message*（1946.10.4），宣示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建立「新生的國家」（viable state）。此後，杜魯門因為稍感意興闌珊，把事情交給接任國務卿的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 1880-1959）；基本上，馬歇爾同意軍方的看法²⁹，相信一旦阿拉伯人發動攻勢，猶太人勢必無力對抗，終究，還是必須仰賴美國出兵³⁰（Spiegel, 1985:

²⁶ 作者是 Barnet Nover，刊登在《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1939.5.18）（Cohen, 1990: 45）。

²⁷ 成員主要是非猶太人，有相當多的美國參眾議員加入。

²⁸ 由於猶太人的難民多位於美國所佔領的西德、以及奧地利。當時美國駐紮德國南部第三軍指揮官巴頓將軍（George S. Patton, 1885-1945）充滿反猶太人思想，甚至於認為他們比動物還不如；也有人主張應該把他們當作犯人關起來，否則，可能會像蝗蟲一般四處擴散（Berger, 2008: 5）。而杜魯門本人則認為猶太人太過於情緒化、阿拉伯人很難溝通、而英國人又不太搭理（Radosh & Radosh, 2009: 298）。

²⁹ 其實，馬歇爾也是心不在焉，一心一意執行杜魯門總統所關注的「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正式名稱為 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Spiegel, 1985: 27）。

³⁰ 國防部估計的遠征兵人數是五萬（Ganin, 1977: 10），而國務院在1945年還誇大為40萬大軍（Judis, 2008: xxiii）。

17; Cohen, 1990: 213)。不過，在聯合國大會通過『181號決議』(1947.11.29)、以及同意巴勒斯坦分治之後，美國支持分治的立場已經很難改變。

整體看來，杜魯門認為猶太人的目標有二：歐洲猶太難民的緊急救濟、以及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復國；開放猶太難民配額是立即的課題，而巴勒斯坦的分治則是長期目標，不能相提並論(Truman, 1956: 144-45)。因此，他雖然因為看到猶太人的浩劫而派 Earl G. Harrison (1899-1955) 前往歐洲考察難民營³¹、進而以人道的理由要求英國開放配額，希望以不流血的方式來伸張正義，然而，他並非毫不保留地支持猶太人的復國³²(Truman, 1956: 157, 161)。對於杜魯門來說，巴勒斯坦是英國的責任，因此，要美國花錢出兵是不可能的(Radosh & Radosh, 2009: 89, 118)。最後，由於英國力不從心，美國因為逃避不了，只好順其自然出面承擔責任，有點像是先上車後補票的年輕父母(Feis, 1969: 12; Sela, 2009: 43)。

參、人格特質

杜魯門出身地方政治，是在派系大老 Tom Pendergast (1873-1945) 的扶植下逐漸展露頭角(Cohen, 1990: 19-25)。他在 1934 年首度當選參議員、又在 1940 年連任一屆，接著就被連尋求任的羅斯福總統延攬為搭檔，在 1945 年宣誓就任美國副總統。沒想到羅斯福不到三個月就過世，杜魯門擔任副總統 82 天，只見過總統兩次，沒有任何見習、或是交接的機會；在倉皇中接任總統，他向記者承認：「我感覺到好像天上的月亮、星星、以及所有的星球，都掉落到我的身上來」(Cochran, 1973: 116-20)。

³¹ Harrison 在向總統提出的調查報告中指出：「我們對待猶太人的方式有如納粹，差別在我們沒有消滅他們」、「他們大多數被關在集中營裡，由我們的憲兵取代納粹禁衛軍」(Berger, 2008: 7)。這當然是很丟臉的一件事。

³² 其實，杜魯門擔任參議員之際，就拒絕連署支持猶太人建國的 *Taft-Wagner Resolution*，主張支持羅斯福政府的立場，也就是不要干涉英國的勢力範圍，以免影響戰局(Cohen, 1990: 46-48)。出任總統，他還公開解釋為何反對這個決議。

由於杜魯門缺乏外交上的經驗³³，他對於幕僚提供的背景分析保持開放的態度；然而，腳踏實地的杜魯門還是有自己的想法，一旦既定方向決定了後³⁴，就會擇善固執³⁵、伺機而動，剛好可以彌補自己的自卑感³⁶；經過波茨坦會議的元首外交洗禮，他對於國際政治的學習加速，不用老是仰賴那些外交官的鼻息（Dougherty & Pfaltzgraff, 1986: 49-50；O'Connor, 1966: 23, 38；Radosh & Radosh, 2009: 335）。基本上，杜魯門是一個有話直說的鄉下人，不過，有時候未免會過於直率，特別是在公然被挑戰的時候，往往會因為震怒而有不當的言論³⁷（Brown, 2009: 7-8；Weinstein, 2009: 25；Leffler, 2009: 132）。

有關於杜魯門的人格特質如何左右美國的以色列政策，大致可以歸納為宗教信仰、以及人道關懷³⁸（Benson, 1994；Wilson, 1972: 66）。Mead（2008）認為兩者都與信仰有關，前者重視《聖經》的先知般預言，相信猶太人一定會回到上主所「應許之地³⁹」（Promised Land）；後者則基於罪惡感，認為

³³ 譬如說，在納粹攻打蘇聯後，擔任參議員的杜魯門幸災樂禍地說：「我倒不介意兩個極權國家要打殊死戰」（Dougherty & Pfaltzgraff, 1986: 46）。

³⁴ 不過，Bain（1979: 91）認為杜魯門的問題在於沒有通盤的政策、只能處理眼前的課題。Berger（2008: 9）也批評為對事情有看法、卻缺乏深度。

³⁵ 然而，後來被總統開除的商業部長 Henry A. Wallace（1888-1965）在日記寫著：從來沒有一個總統向杜魯門那樣，可以蛇鼠兩端、卻又可以讓人感到相當誠懇（Davis, 1981: 84）。

³⁶ 一開頭，不知是客氣、還是自卑，杜魯門一再表示有很多人比他更適合當總統，他的副手 Alben W. Barkley（1877-56）實在看不下去了，勸他不能太謙卑，因為，如果他不能表現出有自信的樣子，別人也不會對他有信心（Cochran, 1973: 118）。當年，杜魯門在追求未來的太太（Beth Truman, 1885-1082）之際，只是一個沒有大學學歷的農夫，家無恆產、口袋沒又錢，前途渺茫，未來的岳家勢利眼，因此朋友並不是那麼看好（Steinberg, 1962: 36-37）。Davidson（2010: 30）認為，由於杜魯門的出生背景，讓他沒有安全感，因此，一輩子必須證明他可以比其他條件好的人做得好。

³⁷ 譬如說，曾經有人在報紙上批評說他的女兒根本歌喉不好，杜魯門甚怒之下寫了一封信說：「不要讓我哪天碰上，屆時，小心眼睛黑青、甚至於下半身需要支撐物」（Brown, 2009: 8-9）。

³⁸ Clifford 認為，杜魯門之所以支持以色列，有其倫理、道德、人道、以及感性的理由（Benson, 1994: 11）。不過，Wilson（1972: 65-66）這些只不過是美國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宣傳。

³⁹ Mead（2008）認為，美國與以色列都是墾殖國家，也就是《聖經》〈出谷紀〉（Exodus, 33: 3）所許諾「流奶流蜜之地」。

過去未能善待猶太教徒，以至於他們不願意皈依基督。不管如何，兩者動之以情、相互強化，對決策者有催化心理的效果。

除了名人傳記，杜魯門最喜歡看的書就是《聖經》，在十二歲時，就從頭到尾讀過兩遍⁴⁰；他對於裡面的歷史故事娓娓道來，有些人物更是比真正的人物還熟悉（Truman, 1973: 52; Miller, 1973: 214）。基本上，他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⁴¹，也是美國總統當中比較有信仰的人，因此，往往會在幕僚所準備的演講稿當中，加入《聖經》的教誨（Benson, 1994: 12-13）。難怪，他的特別顧問 Clifford 在白宮與馬歇爾辯論是否承認以色列之際（1948.3.23），會引用舊約《聖經》〈申命紀〉（Deuteronomy, 1: 8）（Benson, 1994: 17）來佐證：

看，我已將此地擺在你們面前，你們應去佔領上主誓許給你們的祖先亞巴郎、依撒格、雅各伯和他們後裔的地方⁴²。

在 1949 年初，以色列首席猶太祭司 Yitzhak HaLevi Herzog (1888-1959) 晉見杜魯門時說：「上主將你置入令堂的子宮，好幫助以色列在兩千年後重生」，杜魯門淚盈滿眶；當時，杜魯門的特別助理 David K. Niles (1888-1952) 還認為，這位訪客人未免太過於矯揉做作（Steinberg, 1962: 308）。接著，祭司又翻開隨身帶來的《聖經》，唸起〈厄斯德拉〉（Ezra, 1: 2）有關波斯王 Cyrus 的經文：

上天的神「雅威」將地上萬國交给了我，囑咐我在猶大的耶路撒冷，為祂建築一座殿宇⁴³。

沒想到 Niles 眼神往杜魯門那邊瞄過去，總統的眼淚竟然已經滑落（Benson, 1994: 21）。另外，杜魯門下台後訪問紐約市的一所猶太教神學

⁴⁰ 不過，Cohen（1990: 5）認為這是杜魯門的自我吹噓。

⁴¹ 他是浸信會的教徒，直到前往白宮任職之前，擔心給大家造成麻煩，每個星期天才沒有到教會做禮拜（Benson, 1994: 12）。

⁴² 這是天主教（Catholic）思高聖經學會的翻譯，人名與基督教（Protestant）的用法不同（<http://www.catholic.org.tw/katalina/ycw/BLESSING/Bible/ot/Deut.htm#c1>）。

⁴³ 見 <http://www.catholic.org.tw/katalina/ycw/BLESSING/Bible/ot/Esd1.htm>。

院，他的好友 Eddie Jacobson（1891-1955）介紹道：「這位就是幫助我們創建以色列的杜魯門」，杜魯門是這樣子的回答：「甚麼意思，『幫助創建』？我就是 Cyrus！」（Benson, 1994: 22）。顯然地，杜魯門自認為就是解放猶太人的波斯王「Cyrus 再世」（modern Cyrus）。

肆、外部因素

由於杜魯門是由副總統真除，本身一開投沒有民意基礎，因此，只好儘量想辦法蕭規曹隨。史達林在波茨坦會議上態度強硬，杜魯門應該是印象深刻，接著，從最早的伊朗危機（1946）、希臘／及土耳其的騷動（1946.8）、到捷克政變（1948.2）、以及柏林封鎖（1948.6.24-1949.5.12），讓他決心以「圍堵政策⁴⁴」（containment）來對抗蘇聯的擴張（Dougherty & Pfaltzgraff, 1986: 53-62）。美國一向認為近東／中東是英國的勢力範圍，不是美國的責任、也看不到美國的利益，不過，因為猶太人難民問題，杜魯門不得不出面向英國曉以大義。

一、英國的立場

在十九世紀，英國原本支持鄂圖曼土耳其對抗帝俄的擴張（Dougherty & Pfaltzgraff, 1986: 55）。在一次大戰初期，英國首相 Herbert Asquith（1852-1928）轉而鼓舞阿拉伯人起義反抗鄂圖曼土耳其，在 *McMahon-Hussein Correspondence*（1915）答應戰後讓他們獨立建國⁴⁵；另一方面，接任的 Lloyd George 政府又公佈『巴爾福宣言』（1917），答應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國，沒有想到這個承諾在日後會成為英國的負擔。

⁴⁴ 有關於此時『杜魯門主義』（*Truman Doctrine*, 1947）、以及冷戰的背景，見 Freeland（1972）、Dallek（1983）、Brown（1983）、以及 Paterson（1988）。

⁴⁵ 事實上，英國與法國早在 *Sykes-Picot Agreement*（1916）秘密協議瓜分中東的勢力範圍，除了同意讓沙烏地阿拉伯、以及葉門獨立，法國將取得敘利亞、以及黎巴嫩，英國分到伊拉克、以及外約旦（Transjordan），而巴勒斯坦則將成為一個「國際區」（international enclave）（Mulhall, 1995: 60-62; Wikipedia, 2011a）。

英國在 1917 年擊敗土耳其，順勢佔領巴勒斯坦。然而，英國在戰後立即反悔，於 *King-Crane Commission Report* (1919) 表示猶太人的國家很難成立。雖然協約國在 *San Remo Resolution* (1920) 同意英國託管巴勒斯坦，不過，卻正式納入『巴爾福宣言』，並進一步在 *Treaty of Sèvres* (1920) 加以確認。終究，國際聯盟理事會在 1922 年通過 *British Mandate for Palestine*，同意英國於次年開始託管巴勒斯坦⁴⁶。

英國在 1922 年公佈 *Churchill White Paper*，提出「經濟吸收能力」(economic absorptive capacity) 來限制猶太人移民巴勒斯坦⁴⁷。儘管如此，巴勒斯坦的猶太移民還是持續增加，到了 1926 年底，阿拉伯人口有七十七萬，猶太人口已達將近十五萬 (15.8%) (Mulhall, 1995: 91-92)。英國政府在 1930 年接連公佈 *Shaw Commission Report*、*Hope Simpson Commission Report*、以及 *Passfield White Paper* 等三份白皮書，建議政府限制猶太移民到巴勒斯坦，可以看出打定主意食言而肥。

希特勒 (Adolf Hitler, 1889-1945) 在 1933 年上台，德國、以及東歐國家反猶氣氛高漲，猶太人開始出走，不少人偷渡到巴勒斯坦，在 1933-36 期間，就有十六萬多人；此時，在巴勒斯坦的猶太人總數已達三十八萬五 (27.8%)，而阿拉伯人則有九十八萬 (Mulhall, 1995: 97-98)。面對日益增加的猶太移民，阿拉伯人在 1936 年發動罷工，並對英國託管政府進行為期三年的對抗。隨後，英國先後公佈因應的 *Peel Commission Report* (1937)、以及 *Woodhead Commission Report* (1938)，建議讓以色列人、以及阿拉伯人分治，不過，並未獲得以阿雙方支持，最後以『白皮書』(1939) 收場，除了宣示讓巴勒斯坦獨立為單一的阿拉伯人國家，還限制猶太的人數在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下。

⁴⁶ 在國際聯盟的核准下，英國將此塊託管地劃為巴勒斯坦、以及外約旦兩部份，後者採取自治、漸進達成獨立，不受『巴爾福宣言』約束。有關於英國的託管，見 Sanders (1983)、Sherman (1997)、以及 Segev (2001)。

⁴⁷ 另外，這份白皮書澄清，『巴爾福宣言』並非同意巴勒斯坦成爲一個猶太人的民族家園、而是讓這個家園在巴勒斯坦成立 (Wikipedia, 2011b)。除了排除『巴爾福宣言』在外約旦的適用，白皮書的精神是宣示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可以共存在同一個國家，有如加拿大的英法裔、或是南非的英荷裔一般 (Louis, 1978: 53)。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1939-45），希特勒對於猶太人展開滅種（genocide），更加強化猶太人復國的決心。來自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在於紐約集會、通過 *Biltmore Program*（1942），誓言回到巴勒斯坦建國（*Jewish Commonwealth*⁴⁸）。美國總統羅斯福在 1945 年過世，接任的杜魯門在波茨坦會議上要求英國開放猶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緊接著，又公佈 *Harrison's Report*（1945）向英國施壓，而美國參眾兩院也在年底連續通過 *Taft-Wagner Resolution*、以及 *Wright-Compton Resolution*，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國。此時，在巴勒斯坦的猶太人社群 *Yishuv*，已經有自己的學校、公共事業、工會、以及軍隊，儼然是「國中之國」（*state within a state*）（*Radosh & Radosh, 2009: 6*）。

其實，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 1874-1965*）所組的戰爭內閣（1940-45），基本是採取同情猶太人復國運動的態度，主張以分治解決巴勒斯坦問題⁴⁹（*Louis, 1986: 5; 1978: 54*）；不過，隨著猶、阿之間的衝突事件越來越多，邱吉爾不免有先拖過大戰再說的念頭（*Sheffer, 2009: 35*）。原本，工黨一向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復國，因此，在 *Clement Attlee* 上台後（1945.7.26），猶太人欣喜若狂，然而，新政府接受英國殖民辦公室高級文官的說法，立場丕變（*Truman, 1973: 382*）。特別是深得 *Attlee* 信任的外相 *Ernest Bevin*（1884-1951），認為要猶太難民應該安置於歐洲、而非巴勒斯坦⁵⁰，因此堅決反對分治⁵¹、主張成立一個以阿可以和平共存的雙民族國家

⁴⁸ 之所以使用含混的 *commonwealth*、不用比較刺耳的 *sovereign state*（主權國家），主要是要整合溫和派（*Grose, 1983: 168-69*）。其實，羅斯福玩弄文字遊戲，連 *commonwealth* 也不接受，認為『巴爾福宣言』的用字是 *Jewish National Home*、而非 *Jewish Commonwealth*（*Radosh & Radosh, 2009: 19*）。

⁴⁹ 『巴爾福宣言』是邱吉爾擔任殖民部長時宣布的；當『白皮書』（1939）公佈時，他還抨擊政府為反對猶太人的承諾（*Louis, 1986: 5*）。他與其他英國政客最大的不同，就是並非當反對黨才高喊支持猶太人復國（1965: 207）。

⁵⁰ 理由是避免破壞巴勒斯坦的現狀，以免危及英國的地位（*Sheffer, 2009: 35-36*）。

⁵¹ *Bevin* 以為『巴爾福宣言』只不過是英國的片面宣言而以；甚至於，就文字而言只是「贊成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議一個『民族的家園』」（*with a favour the establishment in Palestine a national home for the Jewish people*），而非讓巴勒斯坦成為「猶太人的民族家園」（*Jewish national home*）（*Louis, 1986: 5*）。基本上，他認為猶太人不是「民族」（*nation*）、因此不需要有自己的國家（*Donavan, 1977: 317*）。相對之下，支持猶太人的

⁵²；他對於杜魯門的督促漸感不耐，認為都是因為美國的干預而壞事⁵³，甚至於在工黨的年會口出惡言⁵⁴（Louis, 1986: 1-2, 5）。

聯合國雖然在 1946 年決議讓敘利亞、黎巴嫩、以及約旦獨立，對於巴勒斯坦卻無計可施。面對美國的持續壓力，由於英國需要美國的經濟援助進行重建，不得不採取緩兵之計⁵⁵，建議兩國共同組織調查團；沒想到，*Anglo-American Committee of Inquiry Report*（1946）出爐，竟然建議聯合國託管、讓巴勒斯坦儘快獨立、在年內開放十萬猶太移民簽證，與英國政府『白皮書』（1939）的主張背道而馳⁵⁶。杜魯門打蛇隨棍上，除了支持這份調查報告，還要求英國廢除令人詬病的『白皮書』、解除對於猶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限制。

英國的回應則是要求兩國再組調查委員會，最後所提的 *Morrison-Grady Plan*（1946），建議在英國繼續託管下成立由兩個半自治省組成的聯邦，也

美國參議員 Robert F. Wagner（1877-1953）、以及 Robert A. Taft（1889-1953）寫信給杜魯門，猶太人不只是宗教團體，他們是一個有自己獨特文化的民族（people），就好像捷克人、希臘人、或是愛爾蘭人一樣（Radosh & Radosh, 2009: 121-22）。

⁵² Bevin 的出發點或許是善意的，也就是從加拿大、以及南非的經驗來看，因此，帶有理想主義；另外，從軍事力量、以及經濟利益考量，他認為如果讓巴勒斯坦分治，阿拉伯民族主義者極可能會轉而反英，進而危及英國在中東的霸權、讓英國淪為二流的國家，因此，還是有帝國主義的思維（Louis, 1986: 2-3）。另外，美國國務院的官員也支持雙民族國家，猶太人口居於少數，因此這就是一個實質的阿拉伯國家（Spiegel, 31）。令人好奇的是，英國卻同意印度與巴基斯坦在 1947 年的分治（Hachey, 1972; Fraser, 1984）；或許，當時的流離失所，讓英國對於巴勒斯坦的分治有所保留（Sykes, 1965: 315）。

⁵³ 根據英國在 1945 年的估計，阿拉伯人的人口為一百二十萬，而猶太人已達五十五萬，如果在接受美國所要求的時萬人，將會超過三分之一的上限（Louis, 1986: 7）。

⁵⁴ Bevin 老大不高興，指控美國之所以一再逼迫英國增加十萬人配額到巴勒斯坦，是因為紐約市不願意接納他人（Truman, 1972: 383; Donovan, 1977: 317）；他又大發厥詞，認為要不是風聞共和黨的總統競選對手杜威（Thomas Dewey, 1902-71）打猶太牌的意圖，杜魯門不會那麼好心（Neff, 1995: 45）。他在 1946 年 11 到紐約參加外交部長會議，被認出是英國外相，碼頭工人拒絕處裡他的行李（Louis, 1986: 12）。其實，Bevin 曾經告訴同為工黨的下議院議員 Richard Crossman（1907-74），德國人的殘暴可能是學自猶太人，後者無奈的詰問是，他對於巴勒斯坦議題是瘋了（Sachar, 1972: 507）。

⁵⁵ 杜魯門顯然是相信英國政府的說法，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國，必須考西方國家的軍事保護才可能生存（Cohen, 1990: 51）。

⁵⁶ 不過，該報告並未主張分治，而且認為未來建立的巴勒斯坦國，既不應為阿拉伯國家、也不應為猶太國。有關於該調查團的運作，見 Crossman（1947）一手報告。

就是在分治為兩個國家、以及雙民族國家之間的一種妥協，另外還加上開放十萬猶太移民做為釣餌，不過，並未被任何一方接受⁵⁷。杜魯門則不理會正在進行的倫敦會議（London Conference on Palestine, 1946.9.9-1947.2），未經磋商提出持建立猶太國家的 *Yom Kippur Message*，向英國施加壓力（Levenberg, 1991: 626）。英國在會議結束後提出所謂的 *Bevin Plan*，將自治省的安排調整為瑞士的邦（canton），希望雙方以經濟共同體的方式結合，結果，還是被以阿雙方拒絕（Louis, 1986: 18）。

當時，Bevin 告訴剛入閣的國務卿馬歇爾說，除非是靠刺刀，巴勒斯坦的分治是不可能執行（1947.2.9）；英國欲語還羞，進而要求剛成立的聯合國暫時接管巴勒斯坦（1947.2.18），測試美國是否有意願以聯合國的名義出兵駐紮（Donovan 1977: 323）。沒想到聯合國特別委員會（United Nations Special Committee on Palestine）竟然建議政治分治、經濟整合（1947.8.31），英國乾脆宣告決定撤軍巴勒斯坦⁵⁸（1947.9.20），看誰有能耐出面收拾殘局。沒想到弄假成真，隨著美國、以及蘇聯相繼在聯合國表態支持巴勒斯坦分治，而聯合國大會又通過『181 號決議』（1947.11.29）、賦予巴勒斯坦分治的正當性，英國終於知道回天乏術，於 1948 年 5 月 14 日結束在巴勒斯坦的託管，終於全身而退，解除自己在經濟、以及軍事上的負擔。

二、蘇聯的威脅

照說，蘇聯在中東原本沒有任何淵源，缺乏上下其手的正當性，不過，往南尋求溫水港，一直是俄羅斯領導者從帝俄時代以來念念不忘的戰略目標，因此，如果能在巴勒斯坦有所突破，可以擴張勢力至地中海、以及波斯灣，蘇聯當然不會放棄機會。在希特勒於 1941 年入侵蘇聯後，英國與

⁵⁷ 阿拉伯人堅持巴勒斯坦成為阿拉伯國家，猶太人擔心猶太國的目標無法達成，美國之則唯恐聯邦制被解釋為強制隔離猶太人，進而影響 1986 年的期中選舉（Louis, 1986: 11-12）。

⁵⁸ 中間還有一個小插曲「Exodus 1947 號事件」，來自法國馬賽、滿載猶太難民的汽輪被英國海軍扣押，英國堅持不讓難民上岸、決定遣送位於英國佔領區的漢堡，國際輿論相當不諒解，讓讓英國非常難堪（Wikipedia, 2011c）。

蘇聯分別進軍佔據伊朗南北部；在德黑蘭會議（Teheran Conference, 1943, 11.28-12.1）上，英美蘇三強同意保持伊朗的主權獨立、領土完整；然而，蘇聯戰後不僅拒絕撤軍，還扶植庫德人、以及亞塞拜然人建立自治共和國，難怪羅斯福會說：「Averell⁵⁹ 講得沒有錯，我們可不能跟史達林打交道，因為他已經違背所有在雅爾達會議的承諾⁶⁰」（Dougherty & Pfaltzgraff, 1986: 50）。

二次大戰後，蘇聯所關心的是東歐、以及遠東，而近東／中東在國家安全戰略上的考量則是次要的（Smolansky, 1986: 61）。其實，史達林（Joseph Stalin, 1878-1953）本身既反猶太人、也反對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復國，因此，蘇聯的立場一直是支持以、阿共同組成一個國家，不過，為何史達林後來會改弦更張打「猶太牌⁶¹」，公開宣布支持巴勒斯坦分治、贊成以色列建國⁶²（Feis, 1969: 38-39）？

就短期的目標而言，蘇聯希望英國撤出巴勒斯坦，就長期的戰略而言，則期待能削弱英國在中東的支配（Smolansky, 1986: 75）。對於躍躍欲試的史達林來說，即使外交部也判斷以色列將會親美，如果能離間兩國之間的矛盾，趁機打破英、美在巴勒斯坦的壟斷，還是未嘗不可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復國，賭看看是否能扶植一個社會主義的猶太人國家；加上蘇聯在伊朗北方、以及土耳其東北方的擴張挫敗，因而想要拉攏以色列加入社會主義國家的陣營，換句話說，就是要探探西方國家的底線，看看英、美等國到底有多少捍衛地中海、以及中東勢力範圍的決心（Zubok, 2009: 74-78）。

蘇聯最大的籌碼是開放東歐的猶太難民，讓他們蜂擁至美國所負責的

⁵⁹ 全名為 William Averell Harriman（1891-1986），當時為駐蘇聯大使（1955-58）。

⁶⁰ 美國與英國在雅爾達會議（Yalta Conference, 1945.2.4-11）上接受蘇聯的條件，也就是承諾後者在遠東的利益，以交換蘇聯出兵攻打日本；毫不知情的日本，還天真地寄望蘇聯充當調人，以便取得較好的投降條件（Dougherty & Pfaltzgraff, 1986: 52）。

⁶¹ 事實上，史達林在雅爾達會議上告訴羅斯福，他自己也是猶太復國主義者（Mead, 2008）。

⁶² 外交次長 Andrei Gromyko（1909-89）、以及駐聯合國代表 Semen Tsarapkin 先後在聯合國發言（1947.5.14、10.13），支持猶太人建國的決心，而前者更在聯合國通過『181號決議』之前，臨門一腳，於大會上再度發言支持分治（1947.11.26）（Smolansky, 1986: 66-69）。

難民營；在戰後的兩年之內，兩地的猶太難民由不到十萬人激增為將近二十五萬，就是要看西方國家如何接球（Smolansky, 1986: 65-67）。美國知悉蘇聯的盤算，宣佈對巴勒斯坦實施武器禁運⁶³（1947.12.05）。由於英國支助阿拉伯人，因此，美國的作法在實質上是阻擋美國的猶太人的軍援；蘇聯透過捷克，將剩餘的軍事物資賣給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在以色列宣佈獨立後，蘇聯是第一個宣佈法理承認的大國（Smolansky, 1986: 73）。

其實，早在 1947 年秋天，英國爲了合理化對於猶太難民的限制，開始提供美國有關蘇聯特務出現在中東的情報，尤其是共產黨徒從法國、義大利、以及保加利亞的港口出海，以猶太偷渡客的身分滲透巴勒斯坦；由於美國國務院近東處有自己的盤算，寧願選擇相信這樣的說法（Bergman, 1999: 156-62）。爲了要阻止杜魯門承認以色列，常次 Robert Lovett（1895-1986）向總統報告說，過早承認以色列就好像沒有看到貨就下單子，因爲根據英國、以及美國的情資，蘇聯已經透過猶太人從黑海將共產黨送到巴勒斯坦；不過，在場的 Clifford（1991: 12）認爲，這種說法不僅是捕風捉影、而且是無稽之談，畢竟，這些人千方百計經由東歐、千里迢迢來到巴勒斯坦，就是唾棄共產主義，怎麼有可能向蘇聯靠攏、把以色列變成附庸國。杜魯門（Truman, 1956: 162）在回憶錄說，他可不信外交官那一套，因此，蘇聯威脅的說法不攻自破。

伍、內部因素

杜魯門在決策上是一位強勢的總統，認爲憲法賦予他外交的權限、不喜歡授權給下屬，因此，當商業部長 Wallace 在紐約公然批評美國的蘇聯政策過於嚴苛，惹毛國務卿 James F. Byrnes（1882-1972），第二天馬上因爲逾越本分而被迫離職（Daniels, 1971: 314-16; O'Connor, 1966: 39-40, 44）。Byrnes 把巴勒斯坦事務丟給他的常次 Dean Acheson（1893-1071），自己卻

⁶³ 有關於美國的武器禁運，見 Schechtman（1966: 318-44）。

不忘抱怨總統支配外交決策⁶⁴；杜魯門對於 Byrnes 自以為是、先斬後奏的作風頗有微詞，終究以對蘇聯的談判不力為由要他退休（Spiegel, 1985: 17; Crab & Mulcahy, 1986: 2; Daniels, 1971: 310, 316; Schulzinger, 1994: 202-203; O'Connor, 1966: 37-39）。站在杜魯門的立場，癥結在於這些職業外交官瞧不起他⁶⁵，因此，白宮與國務院的立場涇渭分明，一直要到他自己選上總統後，任命 Acheson 為他的第四位國務卿，彼此才水乳交融（Crabb & Mulcahy, 1986）。

國務院對於杜魯門最大的指控，就是白宮將政治力量介入美國的巴勒斯坦政策制定，也就是國內的選舉的考量壓過外交上的國家利益，特別是屈從於猶太人遊說團體的壓力⁶⁶；這些外交官認為這些人無所不在，而自己往往是國內政治的殉道者（Grose, 1983: 182）。杜魯門的特別顧問 Clifford（1977）則認為這是一派胡言，畢竟，總統在從事重大決策之際，當然要作政治考量；只不過，就承認以色列一事，他認為總統還是比較重視整體的國家戰略考慮。

對於杜魯門來說，政治是人類最高尚的專業，而「總統必須是一個政客，想辦法讓大多數的選民能接受他的政策」，因此，說服以及操作是做一個總統所必須嫻熟的藝術（Truman, 1956: 192; O'Connor, 1966: 25）。而巴勒斯坦涉及猶太人、阿拉伯人、以及英國人三方的立場不同，本身就是糾

⁶⁴ Byrnes 當時號稱「助理總統」（Assistant President）（Cochran 1973: 7），意氣風發，原本以為民主黨應該會提名他當總統候選人，對於杜魯門當上總統，早已老大不高興，而國務卿本來就是一份苦差事，因此，是他在做人情給總統，自己並沒有甚麼虧欠；兩人不僅政策看法不同，連個性也合不來（Daniels, 1971: 308; Schulzinger, 1994: 202）。

⁶⁵ 杜魯門只有高中畢業，而國務院那些人則有傲人的學歷（Saiya, 2005: 8）。Davidson（2010: 33）以為，由於他的出生背景、以及缺乏安全感的個性，讓杜魯門對於國務院那些出自上流社會的人有偏見。

⁶⁶ 儘管美國猶太人很少直接參選，不過，他們的政治影響力卻不容忽視，大致可以使用三種形式來呈現：選票、政治獻金、以及管道（Cohen, 1990: 59; Lieberman, 2009）。美國猶太人除了有支持復國的 Zionist Organization of America，也有由反對復轉為國中立的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以及反對復國的 American Council for Judaism（Spiegel, 1985: 18; Judis, 2008: xxv）；當然，國務院不會放過任何機會加以分化，讓他們自相殘殺（Cohen, 1990: 103）。不過，一旦以色列獨立後，大家都是復國主義的支持者了（Grose, 1983: 308）。另外，有關於石油公司的遊說，見 Cohen（1990: 93-100）。

纏不清的政治問題 (Truman, 1956: 157)。因此，當選民表示支持將猶太難民送到巴勒斯坦、不願觸及猶太人的復國、不希望幫英國分攤責任，總統當然必須審慎考慮 (Bain, 1979: 91)。杜魯門講過一句相當務實的名言 (SearchQuotes, 2011)：

A politician is a man who understands government and it takes a politician to run a government. A statesman is a politician who has been dead ten or fifteen years.

一、官僚政治

杜魯門是副總統扶正，被迫照單接收羅斯福的政治任命閣員，因此，未必叫得動這些前朝人馬，新媳婦見婆婆難免過招 (O'Connor, 1966: 20-21)。譬如說，杜魯門一上任，負責外交政策的國務院就帶著高度懷疑的眼光⁶⁷，留任的國務卿 Edward R. Stettinius, Jr. (1900-49) 迫不及待呈上一份備忘錄，警告他稍安勿躁，不要輕易作任何有關以色列移民、或是猶太人建國的承諾；兩個禮拜後，次卿 Joseph C. Grew (1880-1965) 又送來一份詳細的備忘錄，耳提面命美國對阿拉伯人的保證⁶⁸，此外，他還引述前總統羅斯福當年的觀點，認為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的建國，非要透過武力不可 (Truman, 1956: 132-33)。只不過，杜魯門自認為對於猶太人的慘痛經驗相當關注，對於部屬把他當小孩看，應當是相當光火：

國務院那些打扮光鮮的傢伙 (striped pants boy) 警告我，對於巴勒

⁶⁷ 在 1946 年 8 月，參謀長等人向總統報告土耳其的情勢，而杜魯門也做了裁示，不過，當時擔任德國佔領區司令的艾森豪將軍 (Dwight D. Eisenhower, 1890-1969) 偷偷告訴 Acheson，質疑總統是否真的瞭解決策的重要性、以及可能的影響，因此接續提出簡報，沒想到，杜魯門聽完後馬上攤開地圖，侃侃談了一二十分鐘，當場讓這些下屬瞠目結舌 (Cochran, 1973: 136)。

⁶⁸ 也就是美國在作任何有關改變巴勒斯坦現狀的決定之前，一定會先與以、阿雙方磋商。羅斯福總統在雅爾達會議後與沙烏地阿拉伯國王 Ibn Saud (1876-1953) 會面，後者說，阿拉伯人並沒有犯了希特勒的罪，因此，德國人有責負照顧無家可歸的猶太人 (Ferrell, 1980: 65)。

斯坦要小心行事。他們真的以為我甚麼都不懂。

杜魯門在回憶錄毫不諱言，國務院的所謂「專家」想要阻擋他承認以色列，因為這些人對猶太人帶有偏見⁶⁹、甚至於關心阿拉伯人的反彈勝於對於猶太人苦痛的關懷（Truman, 1956: 164; Grose, 1983: 202）。當他聽說國務院的一些事務官對於他宣布承認以色列感到不解，杜魯門認為，如果他們忠實奉行總統的政策，就不應該有這樣的反應（Truman, 1956: 165）：

問題在於政府中有許多事務官自以為是，認為他們才是真正在做決策、以及執政的人，而民選的官員只是過客。歷來的總統都要面對同樣的課題，也就是如何避免事務官陽奉陰違；這些人往往影響總統所任命的政務官，將自己的觀點凌越政府的政策之上。包括戰爭部、以及海軍部在內，那些將軍往往指揮部長、而非聽命部長，而國務院也是如此。

……我必須講清楚，是美國總統在做外交決策、而非國務院裡面那些二線、或是三線的人。此外，沒有一個可以暗中破壞總統的既定政策。不管是公務人員、將軍、還是外交官，他們只是政府的僕人，必須遵奉民選官員所訂的政策，沒有制定政策的權力。

杜魯門的態度相當強硬，認為只要他擔任總統的一天，就是由他在作決策，而國務院那些「事務官傢伙」（career fellas）的工作就是執行政策；如果他們不高興，隨時可以捲舖蓋走路（Miller, 1973: 216）。

當時，國務院的近東專家認為英國在中東已經日薄西山，因此，如果美國想要取而代之，不管是航權、還是油源，免不了要向阿拉伯人示好⁷⁰，

⁶⁹ 不過，很難說這些人是否有反猶太的心態。國務院的基本立場，是猶太難民應該留在歐洲原來居住的國家，問題是，大部分的難民不願意「回去」傷心之地，企盼前往巴勒斯坦（Spiegel, 1985: 21; Feis, 1969: 26）。

⁷⁰ 國務院內部反對猶太人建國的包括近東主管 Loy Henderson（1892-1086）、馬歇爾的常次 Robert Lovett、政策計畫處長 George Kennan（1904-2005）、以聯合國辦公室主任 Dean Rusk（1909-94）；國防部也擔心猶太國家的出現會危及美國的戰略部署、以及油源，包括部長 James Forrestal（1892-1949）、以及參謀漲 William Leahy（1875-1959）；而中央情報局則斷定猶太人把不過環伺的阿拉伯人大軍（Spiegel, 1985: 17, 32）。

不過，杜魯門有自己的想法，對於這些外交官的看法並不以為然⁷¹；他堅持誰發號司令、以及誰聽命行事的分際，至於白宮與國務院在大方向上並沒有多大的歧見、只有推動速度的差別而已（Truman, 1956: 162）。杜魯門在1945年跳過國務院，要求英國開放巴勒斯坦的猶太移民限制，可以看出總統強烈的主導外交企圖心；沒想到，Acheson 還是呈上一份備忘錄，指陳總統的提議可能造成的負面效果，杜魯門當然是不會太高興（Neff, 1995: 31-33）。

針對以色列政策，白宮先後兩次與國務院進行慘烈的對決。首先，杜魯門在1948年3月18日在白宮私下接見 Weizmann，同意支持聯合國大會的『181號決議』（1947），也就是支持巴勒斯坦分治。沒想到，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Warren Austin（1877-1962）第二天竟然發言，要求中止巴勒斯坦分治、建議由以聯合國⁷²的托管（trusteeship）取代英國的託管（mandate），這不啻給自己的總統打了一個重重的巴掌。杜魯門（Ferrell: 1980: 127）在日記上說（1948.3.20）：

我今天被國務院擺了一道，沒有想到竟然會發生這種事。……今天早上，我發現國務院逆轉我的巴勒斯坦政策。我是看到報紙的報導才知道這一回事，太扯了吧！我現在變成騙子、出賣者，這是我一生的奇恥大辱。

那些在國務院三、四樓的人，一向想要割我的喉。現在，他們終於如願以償。

根據國務院的說法，他們事先已經請示過白宮、而且也獲得總統首肯⁷³；相對之下，杜魯門在主觀上則認為自己只是批示草案的大原則，而且指

⁷¹ 總統的幕僚認為，建立猶太國的情勢已經無法扭轉，此外，阿拉伯人需要美國遠勝於美國需要阿拉伯人，也就是說，根本不用擔心油源，反正他們不論如何也會賣，否則會破產（Spiegel, 1985: 17, 32; Clifford, 1948: 694-95）。

⁷² 由於聯合國是空殼的，實際上是由英國、法國、以及美國三方來執行。

⁷³ 根據常次 Lovett 的備忘錄，他與杜魯門、以及馬歇爾在3月8日討論巴勒斯坦事宜，他記得總統說，如果聯合國沒有辦法解決分治的問題，可以試試其他的辦法，因此確認獲得總統的核可；可惜，這次會議並沒有紀錄（Pogue, 1987: 365）。Grose（1983: 276-78）認為，合理的解釋是彼此的默契不夠，白宮懶得知會國務院有關總統對 Weizmann 的承

示必須是在幾個前提下才同意另起爐灶 (Radosh & Radosh, 2009: 289-30, 303)。這樣的認知落差，究竟國務院是自作主張⁷⁴、還是替杜魯門背黑鍋⁷⁵，有如羅生門一般⁷⁶。對於杜魯門來說，這麼重大的政策大轉彎，國務院竟然沒有將定稿再與總統確認，就逕自訓令駐聯合國代表對外宣佈，除非是忘了，否則，未免是沒有把總統看在眼裡，是可忍、孰不可忍；杜魯門當時寫了一封信給親妹妹，抱怨國務院那些職業外交官的傲慢 (Truman, 1973: 389)：

我禮拜三到國會說明蘇聯的事。在過去半年多來，我花了不少時間跟所有的閣員、以及他人討論。正如往昔，國務院橫加阻礙，想盡辦法來破壞我的計畫。我原本以為，派馬歇爾將軍擔任國務卿可以有所改善，不過，看來他太忙了，三、四樓還是盤據著那些裝腔作勢的陰謀份子。我希望有朝一日，能有機會剷除他們。

杜魯門在 1948 年 3 月 23 日召集國務院官員到白宮開會補救，最後，決議由尷尬的總統親自對外說明，國際託管只是短期因應之道，並非要取代分治，也就是說，兩者並非相互排斥 (Ottolenghi, 2004: 980)。由於年底即將進行改選，而民主黨又在先前的國會期中選舉挫敗 (1946.11.5)，杜魯門當時的民調支持度已經跌到谷底，不希望看到馬歇爾拂袖而去，也就沒

諾，而官僚們反正都知道如何自保，沒有人願意事先幫杜魯門安排退路。Ganin (1977: 23) 則認為，當時杜魯門在度假，親信不在身旁，因此，當國務院拿草案給他看時，總統並不知道已經背離分治；相對地，國務院沒想到總統會同意，見獵心喜，當然不願意費心解釋，以免打草驚蛇。

⁷⁴ 其實，馬歇爾先前宣佈對巴勒斯坦實施武器禁運 (1947.12.5)，杜魯門事先並不知情，也是國務院霸王硬上弓，吃定總統不方便公開反對，以免予外人罩不住的印象 (Radosh & Radosh, 2009: 278)。

⁷⁵ 也就是說，總統要不是搞不清狀況、就是搖擺不定 (Ferrell, 1994: 310)。另一種說法則是杜魯門當時不想碰，打算把爛攤子丟給聯合國，一直到出了事，才不得不出來表態 (Spiegel, 1985: 28-29)。

⁷⁶ 面對事務官的抗命，總統幾乎是束手無策，連羅斯福總統夫人 (Eleanor Roosevelt, 1884-1962) 都威脅要辭去聯合國代表團的職務，杜魯門只能親自出面著手危機處理；他的女兒日後在傳記中表示，因為太丟臉了，她父親生前在回憶錄都不方便提及，只能在他過世後由她來還一個公道 (Truman, 1973: 389)。不過，Cohen (2009: 124) 則認為杜魯門在回憶錄刻意掩飾。

有大肆追究責任，只好下詔罪己，以免讓外人有總統在狀況外、或是內部相互傾軋的印象（Spiegel, 1985: 34; Radosh & Radosh, 2009: 305）。當然，杜魯門私底下必須趕緊透過幕僚向猶太人團體疏通（Postal & Levy, 1973: 322）。

再來，就是面對即將來臨的以色列獨立，杜魯門召集國務院官員到白宮開會（1948.5.12），國王的人馬主張既然生米已經煮成飯、建議做順水人情立即加以承認；國務院官員則認為在尚未獲得聯合國承認之前，美國就搶先承認，未免與國際慣例不符，連馬歇爾都主張事緩則圓（Marshall, 1948）。或許是因為馬歇爾軍人出身，本身討厭政治、也不喜歡黨派之爭，而且在外交政策上又相當獲得總統倚重，難免恃寵而驕；他在會議上滿臉通紅，一副得理不饒人的態度說（Daniels, 1971: 319-21）：

總統，這件事不應該根據政治考慮來決定，因此，除非涉及政治議題，Clifford 先生 [首席顧問] 甚至於根本不應該出現在這個會議上。這是一個重要的外交決策，而政治問題、或是政治意見不應該介入。

馬歇爾甚至於威脅說，如果杜魯門接受 Clifford 的意見，那麼，他在總統大選會把票投給杜魯門的對手⁷⁷；問題是，從馬歇爾自己準備的這份會議紀錄上，真正赤裸裸提到選票的是他自己，認為總統的選票會因為威信受損而減少（Marshall, 1948: 975）。

最後，還是總統出面來打圓場，說 Clifford 是他指示出席的。杜魯門表面上安撫國務卿、給足面子，事實上則已經打定主意⁷⁸；原本，國務院還在頑抗，最後，還是 Clifford 拿出總統來壓，這些事務官才覺悟大勢已去（Grose, 1983: 296）。兩天後，英國結束巴勒斯坦託管、以色列宣佈獨立，

⁷⁷ 根據 Pogue（1987: 371）的說法，馬歇爾或許是不高興 Clifford 說話的態度，才會失態動怒。

⁷⁸ Clifford（1991: 15）回憶杜魯門說：「從來沒有看過將軍這麼生氣，等待塵埃落定，你再去努力一下，看看我們能不能有轉圜的空間。我還是沒有放棄，只不過，我可不能沒有馬歇爾將軍！」

杜魯門擔心夜長夢多⁷⁹，隨即予以實質承認。Clifford (1991: 6) 相當自負，認為本身當時所扮演的角色，等於日後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杜魯門對於馬歇爾的評語是出自善意，只不過，就是對於下屬太過於言聽計從⁸⁰(Cohen, 1990: 215)。

其實，國務院應該有自知之明，總統幕僚的意見代表的就是杜魯門的想法，換句話說，國務卿看到總統的心腹坐在一旁，杜魯門的心意應該是一清二楚 (Spiegel, 1985: 37; Grose, 1983: 290)。由於大家都不看好杜魯門在 1948 年的總統大選有勝算⁸¹，他只好更加仰賴密蘇里幫 (Postal & Levy, 1973: 324)。究竟總統比較信任自己的貼身顧問、還是國務卿，答案應該是相當清楚。

二、選舉考量

杜魯門總統的顧問 Clifford 在大選的前一年準備了一份備忘錄，提醒他猶太選票在紐約州舉足輕重⁸²，也就是自從 1876 年以來，除了威爾森，沒有一個候選人在輸掉該州 47 張總統選人票之後、卻還能贏得總統；Clifford 的分析並非危言聳聽，表面上是 47 票，不過，一來一回，就差了 94 票，而只要 266 張票就可以當選總統 (Cohen: 1990: 60)。回顧 1944 年的總統大選，每十張猶太選票就有九張投給民主黨的羅斯福，因此，面對即將來臨的全國性選舉 (1948)，杜魯門此番親自披掛上場，當然不敢掉以

⁷⁹ 根據杜魯門的回憶錄，國務院還是有人想要阻撓總統的意志力 (Truman, 1956: 164)。馬歇爾打了一通電話給總統，說他不會支持、也不會反對，杜魯門說，這樣就夠了 (Cohen, 1990: 218)。不少朋友慫恿馬歇爾辭職不幹，不過，他認為，總不能因為總統因為履行憲法賦予的決策權力就走人 (Pogue, 1987: 373)。

⁸⁰ 其實，馬歇爾把巴勒斯坦問題授權給次長 Lovett (國防部長 Forrestal 的好友)，本身並不是太進入狀況 (Ganin, 1977: 3)。

⁸¹ 在 1946 年初選後，民主黨氣勢低迷，甚至於考慮徵召共和黨的艾森豪將軍、或是聯邦大法官 William O. Douglas (1898-1980)，杜魯門都沒有保握自己是否會被提名 (Grose, 1983: 217)。

⁸² 猶太人雖然只佔了紐約州的 3% 人口，不過，以總統大選之際的逃票率連看，實際力量是 4%，因此，可以發揮少數的關鍵；其他猶太選民舉足輕重的州有賓州 (36 票)、伊利諾州 (27)、以及俄亥俄州 (23 票) (Cohen, 1990: 60)。

輕心 (Cohen, 1990: 61)。此外，民主黨在 1946 年的期中選舉失利，特別是在紐約州被傳統的猶太支持者嫌棄，而他的共和黨對手現任紐約州長杜威主打猶太牌，這些警訊自然讓杜魯門無法迴避巴勒斯坦分治的問題 (McBride, 2005: 33-34)。

基本上，不管波蘭裔、義大利裔、還是猶太裔，杜魯門表示不喜歡過度的「族群壓力」；同樣地，不管是天主教、還是猶太教，他也不喜歡「宗教國家⁸³」(Cohen, 1990: 53)。其實，他本身並不反對猶太人的遊說努力⁸⁴，只是強調白宮的巴勒斯坦政策絕對不會受到政治力左右 (Cohen, 1990: 67-68)。杜魯門告訴自己的助理 Niles：「如果能拿開美國政治，我們早就可以解決巴勒斯坦的問題」，問題是，他又無法避免直接、或是間接來自猶太團體的壓力⁸⁵ (Donovan, 1977: 319)。總之，杜魯門雖然對於猶太人的壓力不以爲然，對他們的契而不捨的精神卻又不得由衷佩服 (Sachar, 1979: 289-90)。

一度，來自紐約州的兩名民主黨杜魯門籍參議員求見⁸⁶，由於陪見訪客出言不遜，他氣得說：「我可不是紐約客！……這些人只會要求特別利益，而我是美國人」；他事後甚至於還在內閣會議發飆⁸⁷ (1946.7.30) (Donovan, 1977: 319)：

如果耶穌基督生前不能讓他們滿意，又何必期待我的運氣會好一點？……既然他們認為我沒有用，我又何管他們的死活？

然而，由於國會期中選舉在即，共和黨要打猶太牌，特別是在紐約州，

⁸³ 譬如說，他告訴來訪的 Weizmann (1945.12.4)，擔心猶太復國主義者會建立一個種族、或是神學的國家，那就會與美國多元主義的立國精神相互抵觸 (Mulhall, 1995: 121-22)。

⁸⁴ 他曾經向一群外交官解釋：「不好意思，各位先生，我必須面對眾多猶太復國成功的人，然而，我並沒有那麼多阿拉伯選民」(Spiegel, 1985: 19)。

⁸⁵ 一度，猶太人還透過關係遊說總統的母親、以及姐姐，杜魯門回信說 (1945.9.11)，這些是歐洲陰謀者的常用伎倆、千方百計要接觸總統，因此，要她們不要管那些棘手的外交事務 (Ferrell, 1980: 65)。

⁸⁶ 這兩位參議員是 Robert F. Wagner、以及 James M. Mead (1885-1964)。

⁸⁷ 怒氣未消的杜魯門還寫了一封信給民主黨領袖 Ed Flynn (1891-1953)，抱怨道 (1946.8.2)：「當然，英國人控制著巴勒斯坦，因此，除非他們想要，否則，是沒有辦法把十萬猶太人弄進去。我已經想盡量幫忙了，儘管如此，我還是不相信有任何方式可以取悅我們的猶太朋友」(Donovan, 1977: 320)。

將攻擊政府的巴勒斯坦政策，該州的民主黨部負責人 Paul E. Fitzpatrick 打電報給心灰意冷的總統，說乾脆大家都不用選了，因此，杜魯門才會被迫表態，表示將會要求國會開放猶太難民配額，又發表 *Yom Kippur Message* (1946.10.04)，支持建立猶太國 (Donovan, 1977: 319-21)。

在期中選舉過後，眼見美國政府有撒手不管的跡象，激進派猶太復國領袖 Abba Hillel Silver⁸⁸ (1893-1963) 在聯合國指控美國 (1947.5)，竟然爲了討好阿拉伯人而犧牲猶太人的利益，杜魯門憤怒不已⁸⁹，認爲猶太人簡直是忘恩負義 (Cohen, 1990: 67-68)；他告訴助理 Niles：「就交給上主卻決定好了」 (Donovan, 1977: 324)。杜魯門耿耿於懷，終究寫了一封信給羅斯福總統夫人 (1947.8.23)，把猶太人撻伐一番 (Truman, 1973: 384-85)：

國內一些猶太復國者的舉止，將會傷到那些想辦法幫助他們的人。我非常擔心，猶太人就像弱勢者，當他們翻身之際，恐怕會將跟那些迫害者一樣偏執、或是殘忍。真遺憾，因為我一向同情他們。

朝中有人好辦事，遊說團體有發揮影響力，就必須有通往政府的管道。猶太復國運動的外交努力，重點之一就是如何向美國總統遊說，在重要關頭排除不利的因素。在白宮裡面⁹⁰，有兩位猶太人是杜魯門的得力助手，David Niles、以及 Max Lowenthal (1883-1971)，他們行事低調，卻總是能適時提供總統所需要的資訊。杜魯門曾經告訴他的好友 Oscar R. Ewing (民主黨副主席)，自己相當左右爲難，一方面，國務院堅決反對猶太人建國，另一方面，親信又有兩名猶太人，每當跟他們討論巴勒斯坦的事，兩人立刻掉眼淚，真不知道怎麼辦 (Radosh & Radosh, 2009: 287)。

⁸⁸ 領導 American Zionist Emergency Council (AZEC)，由 Zionist Organization of America 衍生。

⁸⁹ Silver 在 1946 年夏晉見總統，沒想到這位祭司竟然跟總統拍桌子，杜魯門事後對一名猶太金主 Abe Feinbegr 抱怨說：「可惡！總統的職務是應該被尊敬的，那個丑角竟然有膽在我面前責難我！……我告訴他，以後不要在來見我了！」 (Radosh & Radosh, 2009: 98; Grose, 1983: 229)。

⁹⁰ 其實，其他部門也都有猶太人的同情者，譬如國務院的顧問 Benjamin V. Cohen (1894-1983)、以及佔領區助理部長 John Hilldring 將軍 (1895-1974)；而羅斯福總統夫人、以及宗教領袖 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 (Spiegel, 1985: 17-18)。

David Niles 是羅斯福總統幕僚當中，唯二被杜魯門留任的人⁹¹。他負責與重要的自由派社團、以及工會聯繫，特別是由華盛頓、紐約、到波斯頓這條東北海岸軸線，居間協調少數族群的壓力團體、安排猶太人意見領袖到白宮晉見總統；儘管他相當受到溫和派猶太復國運動領袖 Stephen Wise 祭司感召、討厭激進的 Abba Hillel Silver 祭司⁹²，不過，他的自我定位並非猶太人在白宮的代表、而是如何保護總統面對形形色色的壓力團體；由於他自知身分敏感，與總統見面從來不帶助理，而且很少參加幕僚會議，也因此多以電話聯絡、儘量不留文字，每到年終就忙著把文件裁掉，免得外流而讓部會首長為難（Cohen, 1990: 76-77）。

支持阿拉伯人的國務院近東主管 Loy Henderson 自始把 Niles 當作死對頭⁹³，認為他不時躲在白宮的角落，幕後策劃、伺機對國務院發動伏擊，也就是說，任何國務院呈送白宮有關於巴勒斯坦的備忘錄，Niles 都會事先看過、並加註意見後才會往上呈閱總統⁹⁴；是否如此，我們不得而知，不過，氣得牙癢癢的 Henderson 認為，他是猶太復國運動中真正有影響力的人，也就是說，如果沒有他，以色列未必能那麼順利獲得聯合國承認⁹⁵（Cohen, 1990: 77）。

Max Lowenthal 是另一名美國承認以色列建國的推手，在杜魯門參議員時就擔任顧問。他雖然不是白宮的正式雇員、也沒有固定的辦公室，卻是

⁹¹ 另一個人是法官出身的 Sam Rosenman (1896-1973)，負責幫總統寫演講稿，每個禮拜跟杜魯門見面（Postal & Levy, 1973: 319）。

⁹² 後者批判前者的「個人外交」（personal diplomacy）途徑，主張「喧嚷式外交」（loud diplomacy）；前者與 Weizmann 合作，被稱為「極小化者」（minimalist），後者支持以色列獨立後的首位總理 David Ben Gurion (1886-1973)，被稱為「極大化者」（maximalist）（Neff, 1995: 20-22; Grose, 1983: 168）。

⁹³ 而國務卿 Byrnes 也相當痛恨 Niles，認為他總是在自己忙不過來的時候來干擾；同樣地，海軍部長 Forrestal 對他的評價是危險、喜歡搞黨派立場、以及鬼鬼崇崇（Grose, 1983: 222）。Henderson 最後被外放到印度當大使（Cohen, 1990: 91）。

⁹⁴ 透過 Niles 以及 Hilldring 將軍，白宮可以跳過國務院，直接指揮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Spiegel, 1985: 28-29）。

⁹⁵ Cohen (1990: 76) 以為，美國在 1948 年 3 月調整巴勒斯坦政策，由支持分治轉為聯合國託管，白宮為此與國務院幾乎鬧翻，一時人仰馬翻、陷入危機，就是因為當時 Niles 生病之故。

Clifford 有關巴勒斯坦的首席顧問，負責幫提供法律見解、並且準備晉見杜魯門的備忘錄，因此，他的觀點無形中左右總統的決策；Lowenthal 勞工律師出身，是美國首位猶太裔大法官 Louis D. Brandeis (1856-1941) 的門徒，由於後者是美國猶太復國運動的要員，前者當然是堅定的支持者⁹⁶；雖然 Lowenthal 必須不時拜訪華府的猶太人團體辦公室，蒐集資料、聽取看法，不過，他行事卻相當低調，自稱從來不和總統討論以色列的事，甚至於在以色列獨立後多年，即使杜魯門寫信推崇他，他還是不願意居功 (Cohen, 1990: 77-81)。

還有一名扮演穿針引線角色的猶太人是 Eddie Jacobson (1891-1955)，他是杜魯門總統在一次大戰的同袍，戰後又合夥開男裝店的。儘管總統的女兒在父親的傳記中極力撇清他們的關係，杜魯門在回憶錄不忘記上一筆。由於杜魯門出身於南方，對於黑人、猶太人、或是亞洲人，在日常生活難免脫口說出語帶輕蔑的用字⁹⁷；不過，對於這位患難中的摯友，杜魯門卻是有情有義，即使進入白宮，只要 Jacobson 一通電話，即使再怎麼不高興，總統還是會接見這位千里迢迢來的老友⁹⁸。

1948 年是大選，巴勒斯坦議題還是無解，一方面，國務院對於聯合國的分治有所保留，另一方面，猶太人團體則認為被出賣而大加撻伐，飽受內憂外患之際，杜魯門在年初就交代不再接見任何猶太人代表。在以色列宣布獨立之前，國務院仍然想要對於推翻聯合國的分治計畫，猶太人風聞，經過老友 Jacobson 的苦苦哀求，杜魯門先是抱怨一些猶太領袖不禮貌、甚

⁹⁶ 杜魯門是在擔任參議員時，透過 Lowenthal 認識這位資深的大法官，因此也機會在每週固定的茶會中論及聊起猶太人復國運動 (Cohen, 1990: 78-79)。

⁹⁷ 杜魯門圖書館在 2003 年找到一本他在 1947 年所寫的日記 (Warshal, 2008: 11-12)，記載著在與前財政部長 Henry Morgenthau, Jr. (1891-1961, 猶太裔) 通話後的感想：「他憑甚麼打電話給我！猶太人根本搞不清國際事務」，他怒氣未消又寫著：

我發現猶太人相當、相當自私。只要自己取得特別待遇，他們才不會管其他難民的死活。一旦他們有權力的時候，他們對於弱勢者的欺負，可能連希特勒、或是史達林都要自嘆不如。

⁹⁸ 其實，杜魯門的另一位軍中袍澤 Herman Rosenberg，也是獲准可以隨時在造訪華府時進入白宮，只不過，他十分低調 (Postal & Levy, 1973: 313-17)。

至於卑劣的作為，終於同意接見 Weizmann、承諾不會改變美國的立場（Radosh & Radosh, 2009: 299-30）。

不過，Clifford 認為猶太選票終究並非總統承認以色列的關鍵，因為他的共和黨對手 Dewey 是紐約州長，再加上 Wallace 在紐約市發難，杜魯門實際上是放棄紐約州，而最後的選票也證實杜魯門輸掉該州；換句話說，如果他那麼在乎猶太選票，就不會再大選前還堅持對以色列採取武器禁運，更不會把對以色列的法理承認拖到大選結束後的四個月（Warshal, 2008: 14）。根據 Lieberman（2009: 250）的實證比較，當時美國猶太人的壓力不大，而以色列卻能獲得美國的支持，因此，必定有其他更重要的因素影響杜魯門的決策。

陸、結語

整體來看，杜魯門是由凡夫俗子魚跳龍門，因緣際會當上總統，憑藉的就是簡單的宗教信仰、以及人道關懷，讓他想要扮演好國家領導者的角色。由於他是接替羅斯福的職務，缺乏統治的正當性，因此，在第一任總統任內，必須對於政府內外的聲音小心應對，包括自行其事的國務院、以及選民對於猶太難民的關懷，政策上看來未免有搖擺的跡象。直到他獲得連任，輕舟已過萬重山，就可以放手馴化外交體系，同時，對於應付猶太團體的壓力也顯得遊刃有餘。

身為世界第一強國的總統，杜魯門知道必須遏阻蘇聯的擴張，而巴勒斯坦並非構思中圍堵的一環，因此，並非美國外交的重點。不過，由於英國國力的衰退，美國不得不扮演主導的角色，持續向英國政府施壓。同樣地，美國也洞察蘇聯伺機介入的企圖心，因此，即使不是有積極參與的意願，卻必須適時回應國際上的發展，特別是蘇聯對以色列的眉來眼去。

儘管美國的國際地位決定了在國際外交的大框架，作為一個杜魯門總統，他還是必須面對國內的政治力量，再外交與內政取得微妙的平衡。就一個務實的政客而言，杜魯門充分運用幕僚與猶太團體所建立的密切關

係，彼此可以感性地交心剖腹，卻又不曾對於說客的要求照單全收。同樣地，他對於國務卿採取騎驢找馬的態度，直到出現可以推心置腹者，至於負隅頑抗的國務院事務官，則交給白宮的幕僚來應付，無堅不摧。

儘管美國是國際結構的擘畫者，其他國家個體並非完全逆來順受。我們在這裡並未討論到的是在巴勒斯坦的猶太人的奮鬥。根據美國人原本的估計，猶太人墾殖者根本沒有力量面對週遭阿拉伯人的圍剿，沒想到他們竟然成功地以寡敵眾，讓美國不得不加速承認的腳步。根據 Ottolenghi (2004: 981) 的觀察，最後決定以色列生死存亡的，還是猶太人是否能夠守住土地；如果本身沒有決心、選擇坐以待斃，美國就沒有任何支持的理由。

附錄：美國承認以色列獨立年表

- 1884.05.08 杜魯門出生於密蘇里州 Lamar
- 1896 Theodor Herzl 倡議猶太國
- 1897.08 猶太人 Basel Program 倡議在巴勒斯坦建國
- 1909 國務院設立 Near East Division
- 1914-18 一次世界大戰、杜魯門以密蘇里民兵陸軍炮兵中尉派往法國
- 1915.07- 英國 *McMahon-Hussein Correspondence* 承諾阿拉伯獨立建國
- 1916 英國與法國 *Sykes-Picot Agreement* 瓜分中東
- 1917 英國擊敗土耳其、佔領巴勒斯坦
- 1917.11.02 英國 *Balfour Declaration* 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民族 national home
- 1919 英國 *King-Crane Commission Report* 認為猶太國很難成立
- 1919.06.28 杜魯門與 Bess Wallace 結婚
- 1920.04.25 *San Remo Resolution* 同意英國託管巴勒斯坦、納入 *Balfour Declaration*
- 1920.08.10 *Treaty of Sèvres* 確認 *San Remo Resolution*
- 1922.06.03 英國 *Churchill White Paper* 提出「經濟吸收能力」原則
- 1922.06.30 國會參眾院通過 *Lodge-Fish Resolution*，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國
- 1922.07.24 國際聯盟同意英國託管巴勒斯坦
- 1924.12.03 *British-American Convention on Palestine*
- 1930.03 英國 *Shaw Commission Report* 建議限制猶太移民到巴勒斯坦
- 1930.10.20 英國 *Hope Simpson Commission Report* 建議限制猶太移民到巴勒斯坦
- 1930.10.21 英國 *Passfield White Paper*（結合 Shaw、Simpson 委員會的結論）
- 1933.01.30 希特勒上台
- 1934.11.06 杜魯門首度當選參議員
- 1936-39 阿拉伯人反抗英國
- 1937.07.07 英國 *Peel Commission Report* 建議分治
- 1938.01 英國 *Woodhead Commission Report* 建議分治

- 1939.05.17 英國 *White Paper* 宣示讓巴勒斯坦獨立為一個阿拉伯人的國家
- 1939.05.25 杜魯門要求將一篇報紙批評英國白皮書的文章列為國會記錄
- 1939-45 二次世界大戰、六百萬猶太人死亡
- 1940.11.05 杜魯門連任參議員
- 1941 杜魯門加入 *American Palestine Committee*
- 1942.05.11 猶太人 *Biltmore Program* 決議在巴勒斯坦建立 *Jewish Commonwealth*
- 1944.01 杜魯門拒絕連署參議院支持猶太人建國的 *Taft-Wagner Resolution*
- 1945.01.20 杜魯門宣示就任美國副總統
- 1945.02.04- 史達林在雅爾達會議向羅斯福揭露自己是猶太復國主義者
- 1945.02.14 羅斯福向沙烏地阿拉伯國王 *Ibn-Saud* 承諾美國的政策不變
- 1945.04.11 羅斯福過世
- 1945.04.12 杜魯門宣誓接任總統
- 1945.04.25 聯合國成立
- 1945.07.03 杜魯門任命 *James F. Byrnes* 國務卿
- 1945.07.17- 杜魯門在波茨坦會議要求英國開放猶太人移民巴勒斯坦
- 1945.07.26 英相 *Clement Attlee* (工黨) 上台
- 1945.08.24 美國 *Harrison's Report* 建議英國開放巴勒斯坦猶太移民
- 1945.08.31 杜魯門要求英相 *Attlee* 開放巴勒斯坦猶太移民配額
- 1945.10.28 杜魯門函沙烏地阿拉伯國王說明為何猶太家園必須在巴勒斯坦
- 1945.11.29 杜魯門說明為何反對 *Taft-Wagner Resolution*
- 1945.12.04 杜魯門接見 *Chaim Weizmann*
- 1945.12.17 參議院通過 *Taft-Wagner Resolution*、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國
- 1945.12.19 眾議院通過 *Wright-Compton Resolution*、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國
- 1946.04.18 聯合國決議讓敘利亞、黎巴嫩、約旦獨立
- 1946.04.20 英美 *Anglo-American Committee of Inquiry Report* 建議聯合國託管
- 1946.04.20 杜魯門公開支持 *AACOI* 報告書、建議英國廢除白皮書
- 1946.07.24 英美 *Morrison-Grady Plan* 建議在聯邦制之下成立兩個自治省
- 1946.08.16 杜魯門表示將要求國會開放猶太難民配額
- 1946.09.09- 英國在倫敦召開巴勒斯坦會議
- 1946.10.04 杜魯門 *Yom Kippur Message* 支持建立 *viable Jewish state*

- 1946.11.05 國會期中選舉、民主黨挫敗
- 1947.01.21 馬歇爾（George Marshall）接任國務卿
- 1947.02 英國提出 *Bevin Plan*，建議採瑞士式聯邦
- 1947.02.18 英國要求聯合國託管巴勒斯坦
- 1947.03.12 杜魯門宣布『杜魯門主義』
- 1947.05.14 蘇聯外交次長 Andrei Gromyko 在聯合國表示支持巴勒斯坦分治
- 1947.08.22 杜魯門召開內閣會議討論「Exodus 1947 號事件」
- 1947.08.31 聯合國 Special Committee on Palestine 報告建議政治分治、經濟整合
- 1947.09.17 國務卿馬歇爾在聯合國大會表示美國願意接受分治
- 1947.09.20 英國決定撤軍巴勒斯坦
- 1947.10.11 駐聯合國副代表 Herschel Johnson 在安理會宣布支持巴勒斯坦分治
- 1947.10.13 蘇聯駐聯合國副代表 Semen Tsarapkin 宣布支持巴勒斯坦分治
- 1947.11.19 杜魯門再度接見 Chaim Weizmann
- 1947.11.29 聯合國大會通過『181 號決議』、同意巴勒斯坦分治
- 1947.12.05 馬歇爾宣佈對巴勒斯坦實施武器禁運
- 1948.03.08 杜魯門宣佈競選連任
- 1948.03.18 杜魯門三度接見 Chaim Weizmann
- 1948.03.19 駐聯合國大使 Warren Austin 要求中止巴勒斯坦分治、建議托管
- 1948.03.23 杜魯門召集國務院官員到白宮開會補救
- 1948.03.25 杜魯門表示，國際託管只是短期因應之道，並非要取代分治
- 1948.05.12 杜魯門召集國務院官員到白宮開會、討論承認以色列
- 1948.05.14 英國結束巴勒斯坦託管、以色列宣佈獨立、美國實質承認
- 1948.05.15 埃及、敘利亞、黎巴嫩、約旦、伊拉克對以色列宣戰
- 1948.11.02 杜魯門贏得總統選舉
- 1949.01.07 停火
- 1949.01.21 艾奇遜（Dean Acheson）接任國務卿
- 1949.01.31 美國法理承認以色列
- 1949.03.04 聯合國安理會承認以色列
- 1953.01.20 杜魯門總統任期屆滿下台

參考文獻

- 施正鋒，1998。〈浩劫與認同的探討〉《族群與民族主義——集體認同的政治分析》頁 137-70。台北：前衛。
- Bain, Kenneth Ray. 1979. *The March to Zion: United States Policy and the Foundation of Israel*. College Station: 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
- Benson, Michael T. 1994. "Harry S. Truman as a Modern Cyrus." *BYU Studies*, Vol. 34, No. 1, pp. 7-27.
- Berger, Alan L. 2008. "Harry S. Truman and Jewish Refugees" in Michael J. Devine, Robert P. Watson, and Robert J. Wolz, eds. *Israel and the Legacy of Harry S. Truman*, pp. 3-10. Kirksville, Mo.: Trum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Bergman, Elihu. 1999. "Unexpected Recognition: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Failure on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to Abort a Jewish State." *Modern Judaism*, Vol. 19, No. 2, pp. 33-71.
- Bethell, Nicholas. 1979. *The Palestine Triangle: The Struggle for the Holy Land, 1935-48*.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 Bickerton, Ian. 1981. "President Truman's Recognition of Israel: Two Views." *American Jewish Archives*, Vol. 33, No. 1, pp. 141-52.
- Brown, Seyom. 1983. *The Faces of Power: Constancy and Change in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from Truman to Reag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rown William A. 2009. "Introduction to Session 1," in Michael J. Devine, ed. *Harry S. Truman, the State of Israel and the Quest for Peace in the Middles East*, pp. 3-9. Kirksville, Mo.: Truman State University.
- Clifford, Clark. 1948. "Memorandum by the President's Special Counsel (Clifford) to President Truman." March 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8*, Vol. 5, *The Near East, South Asia, and Africa*, Pt. 2, pp. 690-96 (<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48v05p2>) (2011/9/12).
- Clifford, Clark, with Richard Holbrooke. 1971. *Counsel to the President: A Memoir*. New York: Random House.
- Clifford, Clark M. 1977. "Recognizing Israel." *American Heritage*, Vol. 28, No. 3 (<http://www.americanheritage.com/print/53556>) (2011/9/12).
- Cochran, Bert. 1973. *Harry Truman and the Crisis Presidency*. New York: Funk & Wagnalls.
- Cohen Michael J. 1982. "Truman and Palestine, 1945-1948: Revisionism, Politics

- and Diplomacy.” *Modern Judaism*, Vol. 2, No. 1, pp. 1-22.
- Cohen, Michael J. 1990. *Truman and Israe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ohen, Michael J. 2009. “Truman’s Recognition of Israel: The Domestic Factor,” in Michael J. Devine, ed. *Harry S. Truman, the State of Israel and the Quest for Peace in the Middles East*, pp. 119-29. Kirksville, Mo.: Truman State University.
- Crabb, Cecil V., Jr., and Kevin V. Mulcahy. 1986. *Presidents and Foreign Policy Making: from FDR to Regan*.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Crossman, Richard. 1947. *Palestine Mission: A Personal Record*.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 Dabiels, Jonathan. 1950. *The Man of Independence*. Port Washington, N.Y.: Kennikat Press.
- Dallek, Robert. 1983. *The American Style of Foreign Policy: Cultural Politics and Foreign Affair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Davidson, Lawrence. 2010. “Truman the Politicia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Israel.”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 39, No. 4, pp. 28-42.
- Davis, Moshe. 1981. “Reflection on Harry S. Truman and the State of Israel,” in Allen Weinstein, and Moshe Ma’oz, ed. *Truman and the American Commitment to Israel: A Thirtieth Anniversary Conference*, pp. 82-85. Jerusalem: Magnes Press.
- Donovan, Robert J. 1977. *Conflict and Crisis: The Presidency of Harry S. Truman, 1945-1948*.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 Dougherty, James E., and Robert L. Pfaltzgraff. 1986.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DR to Reagan*. New York: Harper & Row.
- Elath, Eliahu. 1976. *Zionism at the UN: A Diary of the First Days*.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 Evensen, Bruce J. 1992. “Truman, Palestine and the Cold War.”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28, No. 1, pp. 120-56.
- Feis, Herbert. 1969. *The Birth of Israel: The Tossed Diplomatic Bed*.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 Ferrell, Robert H., ed. 1980. *Off the Record: The Private Papers of Harry S. Truman*. New York: Harper & Row.
- Ferrell, Robert H. 1994. *Harry S. Truman: A Life*.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 Fetter, Henry D. 2008. "‘Showdown in the Oval office’: 12 May 1948 in History." *Israel Affairs*, Vol. 14, No. 3, pp. 499-518.
- Flapan, Simha. 1987. *The Birth of Israel: Myths and Realitie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Fraser, T. G. 1984. *Partition in Ireland, India and Palestin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Freeland, Richard M. 1972. *The Truman Doctrine and the Origins of McCarthyism: Foreign Policy,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l Security 1946-1948*.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Ganin, Zvi. 1977. "The Limits of American Jewish Political Power: America's Retreat from Palestine, November 1947-March 1948." *Jewish Social Studies*, Vol. 39, Nos. 1-2, pp. 1-36.
- Gilbert, Martin. 1985. *The Holocaust: A History of the Jews of Europ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Owl Books.
- Grose, Peter. 1983. *Israel in the Mind of Americ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Hachey, Thomas E. 1972. *The Problem of Partition: Peril to World Peace*. Chicago: Rand McNally & Co.
- Hermann, Charles F., and Gregory Peacock. 1987. "The Evolution and Future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in Charles F. Hermann, Charles W. Kegley, Jr., James N. Rosenau,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pp. 13-32. Boston: Allen & Unwin.
- Herzl, Theodor. 1988. *The Jewish State*. Mineola, N.Y.: Dover Publications.
- Johnson, Paul. 1987. *A History of Jews*.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 Judis, John. 2008. "Introduction: The \$64 Question," in Michael J. Devine, Robert P. Watson, and Robert J. Wolz, eds. *Israel and the Legacy of Harry S. Truman*, pp. xv-xxxv. Kirksville, Mo.: Trum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Kaarbo, Juliet, Jeffrey S. Lantis, and Ryan K. Beasley. 2002. "The Analysis of Foreign Polic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Ryan K. Beasley, Juliet Kaarbo, Jeffrey S. Lantis, and Michael T. Snarr, eds. *Foreign Polic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p. 1-23.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
- Khoury, Fred J. 1976. *The Arab-Israeli Dilemma*, 2nd ed.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 Kirkendall, Richard S. 2009. "The Truman Period as a Research Field," in Michael J. Devine, ed. *Harry S. Truman, the State of Israel and the Quest for Peace in the*

- Middles East*, pp. 10-24. Kirksville, Mo.: Trum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Lansford, Tom. 2008. "Truman's Broader Middle East Policy," in Michael J. Devine, Robert P. Watson, and Robert J. Wolz, eds. *Israel and the Legacy of Harry S. Truman*, pp.28-41. Kirksville, Mo.: Trum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Leffler, Melvyn. 2009. "In Conclusion: Searching for Synthesis," in Michael J. Devine, ed. *Harry S. Truman, the State of Israel and the Quest for Peace in the Middles East*, pp. 131-36. Kirksville, Mo.: Trum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Levenberg, H. 1991. "Bevin's Disillusionment: The London Conference, Autumn 1946."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27, No. 4, pp. 615-30.
- Lieberman, Robert C. 2009. "The 'Israel Lobby' and American Politic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7, No. 2, pp. 235-57.
- Louis, Wm. Roger. 1978. *Imperialism at Ba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ecoloniza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 1941-194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ouis, Wm. Roger. 1986. "British Imperialism and the End of the Palestine Mandate," in Wm. Roger Louis, and Robert W. Stookey, eds. *The End of the Palestine Mandate*, pp. 1-31.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McBride, David. 2005. "For All the Wrong Reasons? Re-evaluating Truman, Domestic Influences, and the Palestine Question." *Digest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14, No. 2, pp. 27-49.
- Marshall, George. 1948. "Memorandum of Observation, by Secretary of State." March 1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8*, Vol. 5, *The Near East, South Asia, and Africa*, Pt. 2, pp. 972-77 (<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48v05p2>) (2011/9/12).
- Maszka, John. 2010. "Constructive Sovereignty: A Ne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odel for an Old Problem." *Strategic Insights*, Vol. 7, No. 4 (<http://www.nps.edu/Academics/centers/ccc/publications/OnlineJournal/2008/Sep/maszkaSep08.pdf>) (2011/9/12).
- Mead, Walter Russell. 2008. "The New Israel and the Old: Why Gentile Americans Back the Jewish State."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 4, pp. 28-46.
- Miller, Merle. 1973. *Plain Speaking: An Oral Biography of Harry S. Truman*.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 Mulhall, John W. 1995. *America and the Foundation of Israel: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Morality of America's Role*. Los Angeles: Deshon Press.

- Neff, Donald. 1995. *Fallen Pillars: U.S. Policy towards Palestine and Israel since 1945*.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Palestine Studies.
- O'Connor, Raymond G., 1966. "Harry S. Truman: New Dimensions of Power," in Edgar E. Robinson, Alexander de Conde, Raymond G. O'Connor, and Martin B. Travis, Jr., *Powers of the President in Foreign Affairs, 1945-1965*, pp. 17-76. San Francisco: Commonwealth Club of California.
- Ottlenghi, Michael. 2004. "Harry Truman's Recognition of Israel." *Historical Journal*, Vol. 47, No. 4, pp. 963-88.
- Paterson, Thomas G. 1988. *Meeting the Communist Threat: Truman to Reag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ogue, Forrest C. 1987. *George C. Marshall: A Statesman 1945-1959*. New York: Viking.
- Postal, Bernard, and Henry W. Levy. 1973. *And the Hills Shouted for Joy: The Day Israel Was Born*. New York: David McKay Co.
- Radosh, Allis, and Ronald Radosh. 2009. *A Safe Haven: Harry S. Truman and the Foundation of Israel*.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 Roth, Cecil. 1970. *A History of the Jews: From Earliest Times through the Six Day War*, rev. ed.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 Rubinstein, Amnon. 1984. *The Zionist Dream Revisited: From Herzl to Gush Emunuim and Back*.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 Sachar, Howard M. 1972. *Europe Leaves the Middles East, 1936-1954*.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Sachar, Howard M. 1979. *A History of Israel: From the Rise of Zionism to Our Tim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Sacher, Harry. 1976 (1952). *Israel: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tate*. Westport, Conn.: Hyperion Press.
- Sanders, Ronald. 1983. *The High Walls of Jerusalem: A History of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and the Birth of the British Mandate for Palestin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 Saiya, Nilay. 2005. "The U.S. Recognition of Israel: A Bureaucratic Politics Model Analysis." (<http://cosmos.ucc.ie/cs1064/jabowen/IPSC/php/art.php?aid=23611>) (2011/9/12).
- Schechtman, Joseph B. 1966.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Jewish State Movement: The Crucial Decade, 1939-1949*. New York: Herzl Press.

- Schulzinger, Robert D. 1994. *American Diplomacy in the Twentieth*, 3r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egev, Tom. 2001. *One Palestine, Complete: Jews and Arabs under the British Mandate*. New York: Owl Books.
- Sela, Avraham. 2009. "The Arabs, Truman, and the Birth of the State of Israel," in Michael J. Devine, ed. *Harry S. Truman, the State of Israel and the Quest for Peace in the Middles East*, pp. 41-66. Kirksville, Mo.: Trum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Sherman, A. J. 1977. *Mandate Days: British Lives in Palestine, 1918-1948*. New York: Thames & Hudson.
- Shih, Cheng-Feng, and Pei-Ing Wu. Winter 2005. "State Power and Globalization: Adjustments of Taiwan's Agricultural Policy under the WTO." *Taiw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1, No. 4, pp. 147-64.
- Smith, Geoffrey S. 1976. "'Harry, We Hardly Know You': Revisionism, Politics and Diplomacy, 1945-1954."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0, No. 2, pp. 560-82.
- Smolansky, Oles M. 1986. "The Soviet Role in Emergence of Israel," in Wm. Roger Louis, and Robert W. Stookey, eds. *The End of the Palestine Mandate*, pp. 1-31.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Spiegel, Steven L. 1985. *The Other Arab-Israel Conflict: Making America's Middles East Policy, from Truman to Reag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teinberg. 1962. *The Man from Missouri: The Life and Times of Harry S. Truman*.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 Sykes, Christopher. 1965. *Crossroads to Israel*. Cleveland: World Publishing Co.
- Taylor, Alan R. 1970 (1950). *Prelude to Israel: An Analysis of Zionist Diplomacy, 1897-1947*. Beirut: Institute of Palestine Studies.
- Truman, Harry S. 1956. *Memoirs of Harry S. Truman*, Vol. 2, *Years of Trial and Hope*. New York: Da Capo Press.
- Truman, Margaret. 1973. *Harry S. Truman*.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 Co.
- Weinstein, Allen. 2009. "A Personal Reappraisal of the Man from Independence," in Michael J. Devine, ed. *Harry S. Truman, the State of Israel and the Quest for Peace in the Middles East*, pp. 25-28. Kirksville, Mo.: Trum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Wikipedia. 2011a. "Sykes-Picot Agreement." ([http://en.wikipedia.org/wiki/Sykes-](http://en.wikipedia.org/wiki/Sykes-Picot_Agreement)

Picot_Agreement) (2011/9/12).

Wikipedia. 2011b. “Churchill White Paper.”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urchill_White_Paper) (2011/9/12).

Wikipedia. 2011c. “SS Exodus.” (http://en.wikipedia.org/wiki/Exodus_1947) (2011/9/12).

Wilson, Evan M. 1972. “The American Interest in the Palestine Ques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Israel.”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Vol. 401, pp. 64-73.

Zubok, Viadislav. 2009.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Israel,” in Michael J. Devine, ed. *Harry S. Truman, the State of Israel and the Quest for Peace in the Middles East*, pp. 81-94. Kirksville, Mo.: Trum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The Recognition of Israel's Independence by the United States

Cheng-Feng Shih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digenous Development and Social Work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Shoufeng, Hualien, TAIWAN

Abstract

The United States formally recognized Israel immediately after it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in 1948.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look into what factors underneath American swift recognition, especially the role President Harry S Truman played. After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Israeli independence, we will examine Truman's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We then proceed to investigate two external factors, British attitudes and Russian threats. Finally, we will explore two domestic factors, 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electoral considerations.

Keywords: Israel,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merican Recognition, Harry S. Truman